

陈家藏书与国家图书馆的深厚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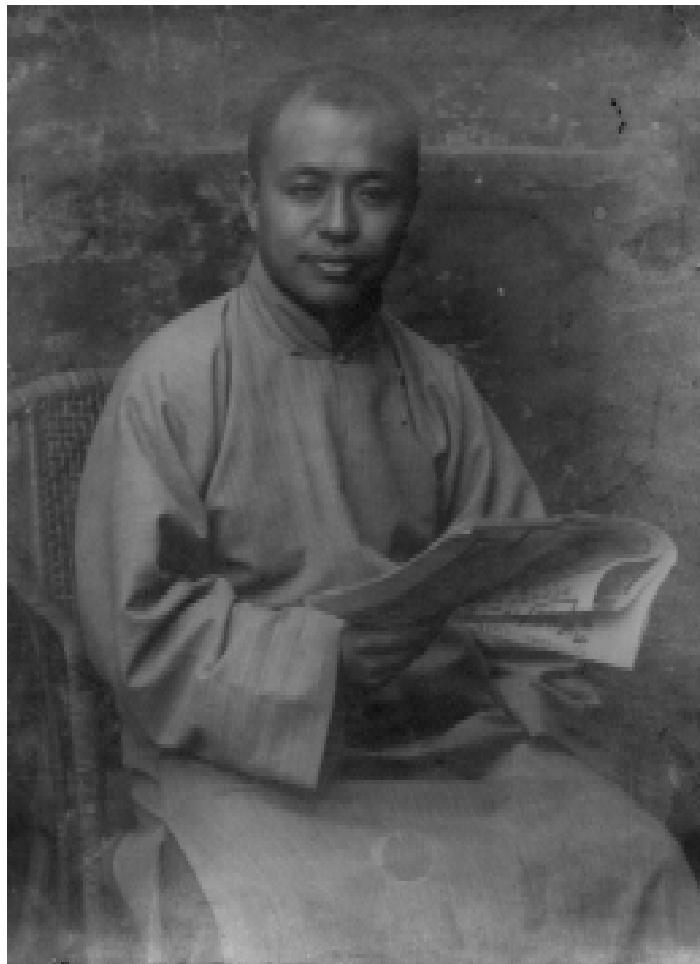
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

丁 瑜

嘉德公司近从海外征获陈清华荀斋遗留的部分藏书，余应邀往观，承嘉德方面之请，为出版《祁阳陈澄中藏书·海外遗珍》书序，耄耋之躯，未敢重负担肩，兹将前此国家购藏陈清华携港藏书经过之所知所见，记录如下，聊供方家参考指正。

一、南陈北周两藏家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陈氏以从事金融银行业起家。公余喜收藏古籍善本，受南海宝礼堂潘宗周影响，尤嗜宋元旧椠、明清精抄、名人校跋之本。所藏毛抄、黄跋品种之多，非同侪藏家能比。陈氏藏书初无藉藉名，因得宋廖莹中世綵堂刊《河东先生集》，后又访得潘氏宝礼堂藏有廖刊《昌黎先生集》，乃不畏周折，以重金购归插架，使两绝妙宋刻珠联璧合，此购书之豪举与痴迷，一时传为书林佳话。按：宋廖莹中为南宋奸相贾似道之幕客，其所刊之昌黎、河东二集，字体版式全同，各卷后有篆文“世綵堂廖氏刻梓家塾”牌记；刻工有孙沅、从善、冯奕之等，亦同见于两集。可知二书同期先后刊版开雕。其用纸选墨亦十分精善，所谓用抚州草抄清江纸，造油烟墨印刷者，即指此二书也。廖刻韩昌黎、柳河东集传至今日，已成孤本，开卷犹光洁如新，墨若点漆，让人醉心悦目。



陈氏因得宋刊台州《荀子》二十卷，前人曾定为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后经多方考证，当为南宋初唐仲友

刻于台州之本。此本书品宽广、字大如钱，疏朗阅目，曾为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诸家收藏。陈氏得此书后，因名其室号“郇斋”。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陈澄中收书之胜，名重一时，故有“南陈北周”之誉。“北周”即天津藏书世家周叔弢先生。周叔弢，名暹（1891—1984），安徽东至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出身书香门第，受其祖父两江总督周馥熏陶，从十六岁即开始买书。其藏书室曰“自庄严堪”，所藏善本珍稀精美。近代四大藏书楼之旧藏均未能逾其右。而郇斋藏书能以后起之秀而获“南陈北周”之雅称，足见其藏书品格之精，质量之高及世人对其藏书之看重。

二、郇斋藏书初露世面

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闻悉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绝不能流入国外。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内地的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与陈氏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的购回了郇斋所藏的第一批善本。其中就有著名的宋廖氏世綵堂刊《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以及许多堪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如北宋刻递修本《汉书》一百卷。此书十行十九字，字体宽广疏朗。清代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所谓北宋景祐监本，即指此书。历经毛晋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瞿氏书散出后，为陈氏郇斋购得。南宋本至明代即以叶论价，北宋本更如凤毛麟角，其珍贵稀罕可以想见。况此本尚有元代倪瓒、清代黄丕烈、顾广圻亲笔跋文，更增其珍贵。

又如：蒙古宪宗六年（1256）北京赵衍刻本《歌诗编》四卷。此书有黄丕烈跋文称：“金刻《李贺歌诗编》四卷，诸家藏书目未之载也。碣石赵衍刊本，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其为金刻无疑，因急收之。书之奇遇之巧，无有过是者，虽重值弗惜矣”。按：近代《四部从刊》、当代《中华再造善本》均以此部为底本影印行世。

再如：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孔氏刻本《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此书亦有黄丕烈跋曰：“今夏五月余自都门归钱塘，何梦华亦自山东曲阜携眷属侨寓于吴中。何固孔氏婿也。其奁赠中有元版《孔氏祖庭广记》五册，装潢古雅，签题似元人书。因出以相示，余诧为惊人秘笈。盖数年所愿见而不得者，一旦见之已属幸事，而梦华乃割爱赠之。赠书之日适梦华将返杭，余赠以行资三十金。今而后士礼居中如获双璧矣。此书裱托过厚，图画皆遭俗手补坏，因损装重修，纤细皆还旧时面目。钱少詹之跋，孙观察之看款，皆于梦华时乞题，今悉存其旧。”按黄跋所言“双璧”乃指此书与宋刻本《东家杂记》二书。

又如：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中的《李长吉文集》四卷、《许用晦文集》二卷、《孙可之文集》十卷。按宋孝宗之后，四川眉山地区刻印多种唐人诗集，世称“蜀刻唐人集”。各集版

式相同，皆半叶十二行。各书均钤有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朱印，明清两代仍藏内府，其他收藏印记甚少。郇斋旧藏善本中宋蜀刻唐人集多种，其两次售书均有唐人集散出，而以此次为最。

此外还有：宋绍定三年（1230）越州读书堂刻《切韻指掌图》、宋淳熙八年（1181）泉州州学刻《禹贡论》二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均是海内孤本，历代藏书家誉为初拓黄庭，光采照人，为宋刻书中杰作。

刻本之外，明清旧抄名人批校题跋之本亦为郇斋此次售书之重点。如：明初抄本《孟东野诗集》十卷，清张文虎校并跋。张文虎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博览群书，深研经学历算，精于校勘。为道咸间著名学者。

又如名人抄校题跋本有：明抄本《贾长江诗集》一卷，清何焯校并跋。《张司业诗集》八卷，清钱孙艾、黄丕烈跋。顺治十八年（1661）陆贻典影宋抄《张司业诗集》三卷，此书陆贻典校并跋，并有黄丕烈跋。陆贻典是汲古阁毛晋幼子毛辰之岳父。其抄本名重书林，况此本尚经黄丕烈跋，更增其名贵，实抄本中之星凤也。

三、善本书库一角

郇斋这批藏书回归大陆后，正值国内许多藏书家出于爱国热情，无偿把家藏珍本捐献给国家的时期，首先倡导者为天津周叔弢先生，步其后者有常熟铁琴铜剑楼后人瞿济苍、北京双鉴楼傅氏、无悔斋赵元方、宝礼堂潘氏等，都曾将辛勤搜集和世代相传的珍贵古籍无条件地献给国家。同时国家也不惜重金在国内外采购了大批珍贵善本书。陈氏郇斋藏书即其一例。为了收藏保管好这批空前集中出现的国宝珍籍，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1956年调整了善本书库的藏书，将原来善本书库布置的恰如宛委洞府，琅函满架，书香拂面，卷帙盈目。书阁橱柜鳞次栉比，曲折迴旋，穿行其中，如入迷宫，1955年新购的郇斋藏书编目后，按序排入善本库中心的小书库中。小库东西狭长约15公尺，南北宽广约二公尺。西接善本甲库，南通乙库。东达禁库，北邻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之经、史库。小书库中南侧排放玻璃书柜七个，内存蔡氏捐献善本和新购郇斋藏书。北侧排放玻璃书柜八个，内存周书弢先生捐赠的部分善本，及潘氏宝礼堂捐赠珍籍。宝礼堂镇堂之宝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礼记正义》七十卷。潘氏以重金购置之宋刻巾箱本《八经》十卷亦存于同一柜中。此二书均为二十年代购自袁克文手。袁克文曾辟“八经室”为藏书处，足证对是书之重视。这些善本珍籍可称之为宝中之宝，善中之善。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今日随着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善本书库迁往新址白石桥，有了更科学的设备和管理。文津街原善本书籍的琅嬛福地已移作他用。虽然如此，但每当路经北海文津街看到图书馆静穆的碧瓦红墙，不由萌发出“从此西城踪迹少，屈指收藏数谁家；况有赵宋景祐本，赏奇差足慰生涯。”的感叹。

四、郇斋再次售书

岁月如流，十年之后，陈氏郇斋再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这时已是1963年，郑振铎局长在文化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因公殉职。王治秋继任文物局局长。王对古籍版本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专家，深知郇斋藏书的品级质量。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依然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南下接洽收购。赵在五十年代洽购郇斋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的清刊本及抄校本。因此提出全部收购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最后只购到香港的旧拓碑帖七种、善本古籍十八种。

1965年11月13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京。那天是个星期六，天灰蒙蒙地，空气湿润而阴冷，似要下雪的样子。车到北京站，赵万里先生下车即回家去了。文物局的金先生提着一把黄灿灿的香蕉守着四只蓝灰色的硬塑箱在等待接站。当我和林君与司机把箱子搬上汽车，金先生提着在北京市场上很难见到的香蕉离去时，很是吸引了站前南来北往旅人的眼球。

这批书籍碑帖虽仅有25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陈氏为之名号“郇斋”的《荀子》就是在这一次购回大陆的。此书雕镂之精，不在北宋监本之下。清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之《荀子》即据此本影刻。宋淳熙间，台州守唐仲友动用公使库钱，指令蒋辉、王定等工匠十八人雕版印制《荀子》、《扬子》二书。借刻书之机，唐仲友命金婆婆诱使要挟匠人蒋辉伪造会子版，私印会子（宋代钱钞）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唐仲友因此为朱熹弹劾罢官。此故事之背景虽为官僚间之政治斗争。但从另一侧面记录了宋版《荀子》刊印的经过，为后世人鉴赏此书提供了更多的遐想。

又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古迂书院刻梓于敬室。此书刻印精美，用纸装潢特异，开本特大而印版版面窄小，蓝绫蝶装，版本精湛堪与《荀子》相颉颃。卷首有“文渊阁印”、“东宫书府”、“万历三十三年查迄”朱印，可证其为明代内阁藏书，入清曾为艺芸精舍汪闓源收藏。

此外尚有宋蜀刻本唐人集《张承吉文集》、元刻本《尔雅》。明初刻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朱淑真断肠诗集》、《元任松乡集》、明弘治本《盐铁论》。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焦氏易林》、《小学五书》、《词苑英华》、《鲍氏集》、范氏天一阁旧藏明刻本《泰山志》、黄丕烈校跋《断肠全集》、清孙星衍校、洪亮吉、顾千里跋清抄本《水经注》等。

碑帖有：宋拓《蜀石经》、《二体石经》、《东海庙残碑》、《佛教遗经》、宋拓残帙《大观帖》和《绎帖》，以及海内外闻名的五代拓本《神策军碑》等。

五、为期一天的展览鉴赏会

郇斋第二次售书较第一次所售书的数量少，但品质却并不逊色。更难得的是购买这批书籍时，正是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经济刚刚起步恢复，却又处在狠抓阶级斗争的萌动之际，批判

《海瑞罢官》的运动正在深入。在此形势下购到这批文化遗产就倍增艰险。万幸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下，终于从香港买回来这批珍贵书帖。运回不久即安排了一次内部展览，邀请有关中央领导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员参观。地点在北京图书馆三号楼的会议室，室中西侧和室中央摆放几张三屉桌，桌面铺上白布把新购到的碑帖书籍平放在桌上，加上一张说明卡，标出书名、版本。由善本组和金石组指定三个人值班，展室门一直是关着的。由赵万里主任和左恭副馆长亲自接待来宾。既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徐平羽、杨秀峰、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治秋、唐弢、丁秀等知名人士都曾光临。下午三时，康生也来了。这时赵万里回家午饭休息尚未回馆。康生的到来，使馆长和值班人员大为紧张，急派人接过来馆。康生对这批书帖发表了不少意见，尤其对陈列的碑帖看得更为仔细。值班人曾向他推荐介绍五代北宋拓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他较认真的欣赏浏览了卷中的十几方藏印及题记。但对宋拓《蜀石经》更为注意，展出的九册他都逐册检阅。除对其中原宋拓《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周礼》很仔细的观赏外，对配补的清木刻印本一册和题写的《蜀石经题跋姓氏录》也未曾轻易放过。他对《蜀石经》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

六、宋拓《蜀石经》

郇斋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又经过若干天的一个星期六，赵万里先生对我说，下班以后留下来，还有些事要办。就是要我协助他把《蜀石经》九册提出清点登记，然后装箱。一切就绪后，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蜀石经》的事。时库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待消息。夜渐深，灯光黯淡，古老的书架偶而发出咯吱吱的声音，时间过的分外慢，直到晚十一时王治秋局长来了。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海。

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过马路即是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经游泳池，车停在甬路西侧，把箱子送到厅房内。王局长和值班秘书谈话，总理让把书留下。之后司机送我出中南海，已是夜半，街上已阒无一人。

《蜀石经》留在总理处，不久“文化大革命”事起，图书馆业务已基本停顿。赵万里主任被迫害病瘫在床，借出的《蜀石经》再无人提起。不料在1969年8月18日，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两位穿军服的中年人提着一个蓝灰色的硬塑箱到了北京图书馆“革委会”。我被叫到办公室，马上看到了郇斋藏书用的箱子，原来很久以前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册，又完整的还回来了。

《蜀石经》初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元年（938），故又称《广政石经》，毕工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前后历时186年。其中《易》、《诗》、《书》、《三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十种经书，为广政年间刻成。至北宋初又续刻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孟子》。十三经全部刻竣，经石立于成都府石经堂。元、明之间屡

遭战乱，经石湮没无闻，全经拓本也极罕见。郇斋旧藏《蜀石经》计有宋、元两朝拓本之《春秋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又附清木刻印本《石经》一册，写本《石经题跋姓名录》一册。这些仅是《蜀石经》全部的不足三分之一，却是现存的《蜀石经》唯一最佳拓本。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家翁方纲、段玉裁、瞿中溶、钱大昕、顾千里等数十人为石经亲笔题跋文，更增加了原书的文献价值。至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在日理万机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指定要检阅这部石经，且留阅经年，那将有待于后人的研究探讨了。

七、昙花一现的宋版《文苑英华》

郇斋旧藏中的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在嘉德1995年秋季拍卖会上突然浮现出来。这是一册历经八百年仍保持宋刊宋印宋装的珍籍。卷内钤有宋、明两代官府印鉴。并附有近代著名藏书家傅沅叔跋文。此书的出现引起文化界、新闻界和收藏家的极大关注。最终却未能珠还合浦回归故园。而是被外商以143万元拍得，持归海外，令国人扼腕慨叹。宋本《文苑英华》在神州大地虽只昙花一现，旋即飘洋而没。但由此引出了书史、古籍书目、大百科全书中有关《文苑英华》条目改写的问题：此宋版残书存世的卷册究竟还有多少？近一个世纪以来，凡有关记载此书存世状况的文献典籍均称原千卷大书，现存世仅有一百三十卷十三册。自嘉德公司的郇斋旧藏本面世后。随着传媒的介绍又引起对此书存世究竟有若干卷册的讨论。最后根据1997年《文献》第一期，李致忠先生著文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文苑英华》十卷一册，恰为此帙中所缺之卷册。”如此纷纭数年之久的宋版《文苑英华》其现存卷册，可确定为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其收藏者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一百三十卷十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十卷一册。海外私家藏十卷一册。宋版千卷巨帙大书，今日存世仅此而已。

此次嘉德公司从海外征集的二十三种陈澄中藏书，就是当年其携港之剩余部分，内中宋元佳刻、黄跋毛钞居其太半，均为罕见珍本。感慨当年国家购书之余，惟望这批善本，勿若《文苑英华》昙花一现，而能留之乡梓，此乃国家文化学术之福祉也。

（丁瑜，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文化部科技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现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顾问等。1954年调入北京图书馆从事中国古籍整理、善本编目工作，经眼善本古籍颇多，在古籍版本鉴定、编目、古籍整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较深造诣。曾经亲历1965年郇斋藏书入藏国家图书馆，此次陈国琅先生转让所藏古籍，受国家图书馆邀请，为鉴定专家之一。此文原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印制《祁阳陈澄中藏书·海外遗珍》，经作者和嘉德公司同意转载于此。）

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

李致忠 徐自强

1965年11月，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和过问下，从香港买回了一批我国古代的珍贵善本书。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发展和校勘出版古籍等工作都具有重要价值。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珍惜祖国文化遗产的实例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在香港居住的藏书家因某种原因，要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十分珍贵的善本书出卖。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人士都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闻知此讯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方面指示有关人员进行联系，一方面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这批书买了回来。书到京后，周总理还抽出时间一一过目，并指示北京图书馆要妥善典藏，供广大研究工作者使用。

这批书分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两部分。其中善本图书有：宋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任松乡集》，元明间刻本《断肠诗词》，明翻元大德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明弘治间涂祯刻本《盐铁论》、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参军集》、《汉书》，汲古阁抄本《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以及清代乾嘉间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跋的《水经注》等。碑帖善拓有：北宋拓本《神策军碑》、宋拓本《佛遗教经》，宋元拓本《蜀石经》、《嘉祐石经》、《大观帖》、元明拓本《绎帖》和明清拓《东海庙残碑》等。现选若干精华介绍如下：

《荀子》二十卷，宋刻宋印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刻印精美，古朴大方。卷二十后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銜名，前人便据此定为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但考版心下方刻工姓名均系南宋刻书工人，足以证明此书系南宋浙江刻本。我们知道，八行十六字的款式是北宋国子监刻书的规格。此本虽然不是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但从书后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銜名和采用八行十六字的款式看，此书很可能是南宋国子监翻刻的北宋熙宁监本。当然南宋监本并不一定都是南宋国子监刻的。宋朝南渡后，偏安一隅，国力衰微，国子监往往下令有关州县校勘某书，将书版送监，就称为监本。浙江系南宋的直辖区，承担这种任务尤多。这部《荀子》的刊刻，很有可能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定它为南宋浙江官刻本比较恰当。

此书开卷有“道乡书院”、“孙朝肃印”、“士礼居”、“汪士钟藏”、“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韩应陛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等藏书印鉴。证明此书在清代曾屡经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等人收藏。过去的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得到善本书，多半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这部《荀子》就是长期为他们所把持，使得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研究《荀子》的人，都因未见到此刻本而深感遗憾。售书的这位香港藏

书家，因藏有此书，十分珍视，曾给它的藏书楼取名“荀斋”。此书典藏北图后，为提供给各方面研究参考，文物出版社曾于一九七五年将此书影印出版。

《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元成宗铁穆尔大德九年（1305）湖南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陈仁子号古迂，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举漕试第一，后五年南宋灭亡。入元后誓不出仕，营别墅于茶陵东山，专事讲学、著述和刻书。此本《梦溪笔谈》就是陈氏东山书院刻书之一。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开本大，版心小，天头地脚都很宽，元时蝴蝶装，别具风格。

《梦溪笔谈》，北宋刻本早已失传。南宋孝宗赵眘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刻本，清代时也已散佚。因此，现在传世最早的刻本，就是元大德九年茶陵陈仁子的这个本子了。此刻本目次前，首附沈括自序及古迂陈氏刻书序。序末题“大德乙巳春茶陵古迂陈仁子刻于东山书院并序。”次附乾道二年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目次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牌记。说明此本是直接承宋本而来的。此本明代为内阁藏书。开卷有明初“文渊阁”玉印及“万历三十三年查訖”朱记可证。入清后，又成为汪士钟“艺芸精舍”藏书。解放后，有人汇集“笔谈”的各种版本，参酌互校，出版了新本子。但终因未见到此本而感到美中不足。现在不但有了这个原本，文物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这个本子，这就为《笔谈》的研究和校勘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此外，这个刻本在印纸上也很有特色。据有关造纸的同志专门鉴定分析，认为此书是用皮纸印造，纸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的石灰质，可能对防潮、防蠹有一定的作用。此书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但至今宛如新印，毫无霉蠹现象。这又为研究古代造纸技术和图书防蠹方法等，提供了实物材料。

《张承吉文集》，宋蜀刻十卷本。张承吉即张祜，又号张处士，中唐著名诗人。张氏一生留下多少作品很难详考。《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祜诗》一卷。明朝朱警辑唐人诗，于嘉靖十九年刻成《唐百家诗》，其中，中唐二十七家诗人中收有《张处士诗集》五卷。清朝席启寓琴川书屋于康熙四十一年，又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其中第二函收有《张祜诗集》二卷。清刘世珩辑刻《贵池先哲遗书》，其中在《贵池唐人集》中收有《张处士诗集》五卷。此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拜经楼吴氏有旧抄本《张承吉集》六卷。可见张氏文集的通行本为二卷本和五卷本，最多亦不过六卷。而这部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却多至十卷：第一卷收张氏五言杂题七十二首；第二卷五言杂诗四十五首；第三卷五言杂诗四十七首；第四卷七言杂题五十首；第五卷七言杂题四十七首；第六卷五言杂题六十首；第七卷七言杂题三十八首；第八卷杂题六十四首；第九卷五七言长韵三十首；第十卷五七言长韵十六首；凡四百六十九首。这不但在收诗数量上，超过通行本，文字上也远胜通行本。为研究张承吉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乃至校正通行本的谬误等方面提供了最早最珍贵的版本。

此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字近颜体，初印精美，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完全是宋蜀刻本的风格。

蜀本的特点是字体多似颜鲁公，字划肥劲朴厚。大多数是白口，左右双边。纸质莹洁，校

勘精审，可与浙本相媲美。可惜南宋末年元兵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此，蜀本流传到现在的要比浙本和建本少得多。

此本《张承吉文集》元时为官书，开卷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印鉴可证。清初为山东刘体仁七松堂藏书，有“颖川刘考功藏书印”可证。

《鲍参军集》、《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汉书》同属清代毛氏汲古阁的影抄本。毛氏汲古阁的抄本在版本学的研究上历来享有盛名。特别是毛氏汲古阁的影抄本，就更为后世所珍重。《鲍参军集》系毛氏影宋抄本，其摹写之精，堪称独绝。此书宋刻本久已散佚，影宋抄本亦仅见此本。文字可校正通行本处甚多。世称“毛抄仅下宋本一等，”此本则是享有这种盛名的代表作。其它如《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汉书》等，也都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尤其是影宋抄本的《汉书》，其摹写工致绝伦，形神逼真，很似宋刻。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843）立于皇宫禁地，外人很少能得见者，椎拓更为困难。从宋至今只传此一种，世称“宋拓孤本”。此册，宋拓、库装、硬镶、剜裱。裱本每半开长（即高）34、宽22.7厘米，心子每页长26.5、宽15.5厘米。大字每页3行，中字每页4行。现存五十四页，尚缺一开（二页）。据安岐《墨缘汇观》记载，此碑“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五十六页；后文至嘉其诚止”。现在，此本只二十七开、五十四页，从拓本剪条后每条的小字编号看，其四十二与四十三页之间，正好缺一开二页，六行三十字。可见此一开之缺，当在安岐收藏之后。碑文从开始至“来朝上京嘉其诚”的“诚”字止，为碑的前半，以下全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未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只列碑名，分为上下二册。故碑可能在北宋时已不存在，而此本很可能为唐末五代所拓。

此本流传有绪，递藏分明，在现存拓本中是少有的。可考的最初入藏者，南宋时为权相贾似道所有，拓本首页有“秋壑图书”印记可证。入元后为官书，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条记。明初，先归内府，后入“晋王”家，拓本中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的小金字记载和“晋府图书”印。清初，又归北平孙承泽，后为梁清标、安仪周（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神策军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初设在甘肃临洮，为边防守军，后来演变为五大禁军之一。唐德宗贞元时，分神策为左右厢，而且均由宦官分统。柳书《神策军碑》记载的就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时的情形。内容当然是歌功颂德，史料价值不高。但在保存柳字方面，则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国书法的发展，到唐时已形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欧、褚、颜、柳即为当时各派书家代表，被誉为唐代书法四大家。柳公权，字诚悬，生于大历八年（773），卒于咸通元年（860），为唐代后期著名书法家。柳字笔法瘦劲，自成一派，为历来学大楷者的范本。此碑为柳公权晚年（71岁）所书，比人们熟知的代表作《玄秘塔》，笔法更为精练遒劲。加之摹刻精工，拓碑时代较早，拓工手法亦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柳字神韵，实为现存柳书中最佳者，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将此拓本影印出版，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和研究

家们，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

《佛遗教经》全名为《佛海涅槃略说教诫经》，宋代麻纸毡拓、硬镶、剜裱、墨镶边。曾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官吏袁忠彻的家藏，后归范氏天一阁。范大澈在其所著《碑帖纪证》一书中曾有著录，时人文彭等也曾过目或者收藏过。清初归安仪周所有，以后则被清庭内府收藏，乾隆、光绪、宣统等皇帝均钤有鉴赏玺印。此碑，在宋初，人们就盛传为王右军书，独欧阳公认为不然。以后，虽也常说：“大字莫过瘗鹤铭，小字莫过遗教经”，因见其笔法遒媚，也仍把它传为王羲之所书；但其实，《瘗鹤铭》乃陶弘景笔迹，《遗教经》乃唐释道常所书，均与王右军无关。不过，此拓本书法甚精，有晋唐小楷风韵，确为重要的书法珍品。

《东海庙碑》，东汉灵帝熹平元年（172）立于江苏海州。隶书。阳刻碑文，阴有重修祠时的刻字。南宋洪适在其所著《隶释》中曾录有碑文和碑阴刻字，但同时也指出：“海庙一椽不存，自今非四十年前旧物，不复见此刻矣。欧阳公时，天下一家，汉碑虽在遐陬穷谷，无胫而可至。《集古录》中已屡言难得，可为宝，况今乎！”可见，在宋时，此碑已不复存在，洪氏著录，可能也仅据拓本。明、清时，诸家著录均未及此。现在要收此拓本，就是较佳翻本也极难得。此次入藏者，为翻刻本。明或清初拓，硬镶、剜裱、墨镶边。阳存字九、阴存字十七。道光二十一年（1842）前后发现于淮南，曾为顾湘舟、谭敬、徐渭仁等收藏，并有时人梁章钜、钱泳、费屺怀等的题跋，可为研究考证的参考。

《大观帖》，北宋大观三年（1109）一月，徽宗诏刻，蔡京书签及卷首，立石于太清楼。此次收集入藏者，经折装，存二卷。卷一，淡墨宋拓，收东汉章帝至唐代高宗等历代帝王草书和行书帖十七种。卷二，浓墨元明拓，翻刻本，收东汉至晋的历代名臣：张芝、钟繇、王象等草书、行书、小楷帖十九种。草书字旁有乾嘉时人徐真木的朱笔注释。

《绛帖》，北宋潘师旦所摹刻。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损。淳化三年（992）刻于山西绛州，故称《绛帖》。以后，刻此帖者甚多，有补刻“公库本”、“私家本”及伪刻十二卷本等，其它翻刻则不胜枚举。这次收藏的《绛帖》、存二卷，翻刻本，元或明初拓，曾经明代中叶著名书法家周天球等过目或收藏，亦为少有的书法资料。

《蜀石经》，始刻于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故又称《广政石经》。毕工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余年。孟昶始刻时，以唐文宗大和本“经”书为底本，加上各家注疏，由张德钊等用楷字书写，陈德谦等刻石，宰相毋昭裔校勘督造。刻了《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一至十七卷）、《孝经》、《论语》、《尔雅》等十种；北宋时，经田况等书写，刻全《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又续刻了《公羊传》、《谷梁传》、《孟子》三种，共为十三经。竣工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该经，在南宋初期尚完好，到理宗嘉熙、淳祐以后始亡，元明之际不闻。现在，石经拓本也十分稀少。此次入藏的《蜀石经》，计有墨拓本七册，其中《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一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一册。墨本年代均为宋元拓，其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内府官印，可证

为宋拓无疑。墨本中还有清乾隆嘉庆时的著名金石家翁方纲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资料，可为今天研究参考。尤其在“经”文中加刻注文，为历代石经所无，为宋人所重视，也为今天保存了不少资料。

《嘉祐石经》，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401）开始刊刻，嘉祐六年（1061）竣工，书体一篆一真相间，故又称《二体石经》。书石者为杨南仲等人。刻石后，立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太学。靖康之变，赵构南迁，石经残毁，金、元时虽又补刻，元末又佚。现在，仅在开封博物馆存有少部份原石。今天，就是拓本也极少。此次收藏的四巨册《嘉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七种，量达三百七十多3页，三万多字，实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石经中最好的一种。此本原为清人丁晏于咸丰七年（1857）五月发现于淮安书肆，收购回家，重装为四巨册。当时，另外还装有名人题记一卷，未与这四大册连属。因此，后来转卖时，未一并出售。此卷题记现藏上海图书馆。这几册石经，均为宋、元墨拓。经多次装订，最后为丁晏所重装。大幅经折剜裱，极为壮观。

从以上介绍，可见北京图书馆入藏的这批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其意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每当我们展视和利用这批珍贵资料时，总要想起敬爱的周总理，缅怀他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无限珍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此文原载《文献》1979年第1辑，经作者同意转载。）

周恩来总理关心陈清华藏书的一段轶事

赵深先生回忆：1965年陈清华藏书购回馆之后的某一天，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去馆里上班，下班后很晚没有回来，家人很着急。夜里12点后，赵先生坐图书馆的小车回来，显得很兴奋，说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周总理介绍了新买的陈清华藏书。赵先生说，当天下午，北图奉命到紫光阁，把陈清华书环布在桌子上展示。总理很晚才来，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比如某书上有溥仪题字，总理问是不是从宫中出来的等等。赵先生曾对总理谈到书的价格，说花了国家20万元港币，是不是太贵了。总理说，不要紧的！我们去香港演两天戏，这钱就回来了。赵先生平时不对家人谈图书馆的事，这天实在是太激动了。

（注：赵深先生为赵万里先生长子，此文为赵深先生口述，现任善本部主任张志清整理）